

# “孽海”之“花”为何而开

## ——评小说《孽海花》的思想倾向

简 茂 森

曾朴的小说《孽海花》，当一九〇五年初版问世时，曾轰动一时，一二年内，竟“再版至十五次，行销不下五万部。”<sup>①</sup>被时人誉为当时小说中的“巨擘。”<sup>②</sup>对此，连作者也深感意外，禁不住得意地惊呼：“此书实在是个幸运儿”！<sup>③</sup>其后，《孽海花》的评论者，也大多肯定作品积极的思想倾向，强调小说反映了民主主义思想，指出它“不仅昭示了清社崩溃的必然，也是革命必然成功的信号。”<sup>④</sup>但也有少数评论者针锋相对地指出：“作品主要还是带着改良主义的政治倾向”，<sup>⑤</sup>“严格地讲，把它称作谴责小说都很勉强”，特别是对一九二七年的修改本，他们否定得就更为彻底，说：“这本书中具有积极意义的东西本来就不很多，再经这一番删削修改，它的思想内容越发显得反动、无聊。”一言以蔽之，《孽海花》是一部反动小说。

事实究竟如何？“孽海”之“花”，到底为何而开？

《孽海花》是部未曾写完的作品，作者原计划写“一部齐齐整整六十回奇文”<sup>⑥</sup>的长篇巨著，并拟就了回目，最后一回题目：“专制国终摆专制祸，自由神还放自由花”，可见作者有意要把小说写成一部反对封建专制，歌颂民主自由的作品了。事实上，初版小说确有不乏反帝反封建的激烈言论。作者从抨击“科名”入手，无情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和黑暗，痛斥“历代专制君王”，“只顾一时的安稳，不顾万世的福祸”，弄得“异族

凭陵，国权沦丧”，谴责清王朝继承历代君王反动衣钵，更把国家搞得不可收拾，“倒叫外国人来耀武扬威”，“鲸吞蚕食起来”，眼见国将不国。作者愤怒地指出，英、俄、法、德等帝国列强是“世界魔王”，他们始终盯着中国这块“肥肉”，一有机会就妄图鲸吞和瓜分中国。当然，修改后的《孽海花》，作者将这些激烈言论砍掉了，但作品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倾向，是否就因此荡然无存，消失殆尽呢？没有。修改后的第一回，作者在开场诗中就悲愤写道：“江山吟罢精灵泣，中原自由魂断”<sup>⑦</sup>控诉封建专制制度涂炭生灵，扼杀自由的反动罪行。紧接着，作者以“奴乐岛”象征中国，指出“奴乐岛”尽管山川明丽，花木美秀，但终年光景，却是“天低云黯，半阴不晴”，缺乏“天空新气”，毫无自由。因为帝王昏暴已极：“暴也暴到吕政、奥古士都、成吉思汗，路易十四的地位；昏也昏到隋炀帝、李后主、查理士、路易十八的地位”。于是，一阵狂潮袭来，“奴乐岛”更是岌岌可危，陆沉在即。这里，作者用象征手法，把清王朝的黑暗和反动，腐朽和没落，明显地呈现在读者面前。

尤其是，《孽海花》是一部小说，其政治倾向，“应当是不要特别地说出，而要让它自己从场面和情节中流露出来。”<sup>⑧</sup>修改后的《孽海花》虽删弃一些激烈的反封建言论，但全书以金雯青和傅彩云婚姻故事为线索，通过对“达官名士”的无情揭露，还是相当广泛地暴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，抨击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昏庸和无能，体现了作品

积极的反封建精神。

鲁迅先生在谈及《孽海花》的艺术成就时指出：“并写当时达官名士，亦极淋漓。”<sup>⑩</sup>的确，小说对“达官名士”的描绘和刻划，真可谓淋漓尽致，入木三分。只要读读《孽海花》对这批“达官名士”，无不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他们丑恶的嘴脸和卑劣的行径，就宛在眼前。看，面对内忧外患，他们一个个懦弱无力，醉生梦死，对国家和民族的存亡无动于衷，无能为力，几乎没有一个能够激流勇进，力挽狂澜。达官之中，上自尚书、中堂，下至巡抚督办，虽有顽固派和维新派的不同，主战派和投降派的差别，但在本质上却是一丘之貉。事实就是这样，投降派屈服列强，一味主和，甚至开门揖盗；恨不得把祖国大好河山，全部拱手送给帝国列强。投降派威毅伯（影射李鸿章）就是这样。那些维新派、主战派尽管口头上标榜“维新”、“主战”，实际上却“主”而不“战”，只是忙于“拓铭、读碑、打砖、数钱、洗砚、考印”，甚至公然鼓吹“以酒为缘，以色为缘”，宣扬“诚心看戏，诚意看戏”，一味追欢买笑，沉迷酒色，那里还顾得上什么国家和民族的利益。对此，作者在作品中，曾痛心指出，当时旗人贵族之中，除了潘尚书，其余的都是“养尊处优”，没有一个顶用；朝廷之上，唯有高理惺（影射李鸿藻）和龚和甫（影射翁同龢），还属于“肯任事的正人”，其他的则要末“貌恭心险”，要末就是“外正内贪”，尽是“乱国有余，治国不足的人”。至于尚书、中堂以下那帮文武官员，更不过是“备员画诺罢了”，根本派不了用场。意味深长的是，就是作者眼中的“正人君子”，在他的笔下，也是个丑态百出，昏庸误国。那个潘尚书，旗人的矫矫者，国难当前，他却醉心于祭什么汉代何休，搞什么“公羊母羊”，别出心裁地闹笑话！说到高理惺和龚和甫，则一个是“意气用事，见理不明”，一个是“世故太深，遇事寡断”。因而，尽管甲午战争炮火连天，日帝进逼国门，这两位号称“朝廷柱石”的“正人”，“主战”派的首领，却是一个

“谈灾变”，一个“说梦占”，甚至大写什么“失鹤零丁”，为一只失鹤煞费苦心，如丧考妣，而对国家主权领土的丧失，却熟视无睹，处之泰然。结果是“主”而不战，“战”而失地，到头来又不得不借助于和议，任凭威毅伯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。他们和投降派，不是很难分出高下吗？如果有什么区别，不过是投降派一心卖国，而“主战”派，则是昏庸误国罢了！真是“洪洞县里无好人”！

达官贵人而外，作品还描写了一批所谓的“名士”，别看他们神气十足，道貌岸然，儒雅大度，其实尽是一伙沽名钓誉，吹牛拍马，庸俗不堪的角色，有的简直就是毫无真才实学的无赖文痞。“名士”之中，有一位鼎鼎有名的叫李治民纯客，时人誉为“一时之杰”，可谓“德高望重”的大“名士”了。然而，就是这位大“名士”，专会拿腔作势，故弄玄虚，丑恶得可怜而又可恨。第十九回写道：一群达官贵人，为借助这位“名士”的捧场，玩了个“擒贼擒王”的诡计，故意凑趣于成伯怡祭酒的云卧园，为这位老“名士”祝寿作生日。这本来是他抬高身价的大好时机，“心里要去得很哩”！可是，他偏偏要装出“名士”风度，不经再三“劝驾”，硬是不肯轻易就“擒”。果然，他无病装病，自称“妄人”，似乎玉步难移，不肯“屈驾”。后来他捞到钱财，又得知不出钱也可以“闹闹相公”，于是乎，“风云突变”，顷刻之间，“秋兴勃发”，把装病一层忘得干干净净，连声高叫“去休！去休！”，看其兴致比谁都高！“名士”也者，原来如此：表面斯文，内里空虚，功名富贵，何曾一刻忘怀？标榜“妄人”，不过是以“妄”求誉，以“妄”求“官”罢了。

达官和“名士”，原是一对孪生兄弟，一条藤上的两只毒瓜。如果说达官贵人是封建统治的体现者和执行者，那末所谓“名士”，就是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和封建官吏的后备军。达官与“名士”二而为一，一而为一。“名士”，总是把当“官”作为归宿，今日的“名士”，可能就是明日的“官”，而今日的“官”，

一旦脱下官装，又可能就是一位“名士”；有的更是“达官”、“名士”兼而有之，一身二任焉。因此，“名士”的不学无术，寡廉鲜耻，也恰恰就是官吏的愚昧昏庸，卑鄙龌龊。看，那些由“名士”而“官”的人，哪个不是这样呢？就说那被京里人称为“清流党”的“六君子”吧，他们又是“清流”，又是“君子”，当然是“名士”无疑了！在他们未当官之前，确也以“名士”自诩，洋洋得意，可是一旦为官，哪一个不是洋相出足？那位庄崧樵，当他还是个穷翰林，身为“名士”时，好象很有点“血气”，曾经因穷极无奈，很“参”了一批作恶多端的“官儿”，“半年间靠着他那根秃笔，就不知被他拔掉了多少红顶儿”。可是，一旦升了官，飞黄腾达，他同样“气焰熏天”，目中无人，骄横得比谁都可怕，“落得一场话柄”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中主人公金雯青，他早年是所谓“海天四友”之一，后来又成了出使德、俄、意、奥四国的堂堂公使，当然也是个官僚“名士”的代表了。他怎么样呢？表面看来精明强干，彬彬有礼，颇得人望，其实也是个昏聩无能、卑劣不堪的十足伪君子。他未中状元，甜言蜜语，骗取妓女梁新燕的信任，一中状元，却残酷地将有功之人，拒之门外，推之死地；母孝在身，又玩弄花招，纳妓聘妾，眠花宿柳；看到一个漂亮的外国女子，就“不知不觉看得呆了”，险些连“魂灵”，也被勾去，甚至无耻鼓吹：“英雄无奈是多情，吾辈一生，总跳不出情关情海”；那里是什么“名士”，简直是登徒子好色之徒。他功名心切，刚中状元，就要学“西法”，识“洋务”，一心向往到“总理衙门当一个差”，成了公使，又企求所谓“千秋不刊之业”。倘若有才有德，倒也不必多加非议，可他又是那样低能无知，一再受到愚弄，最后甚至连国家大片领土拱手让人，还自以为功于国，自鸣得意，这就难怪夏雅丽要嘲弄他“是糊涂的蠢虫”。书中傅彩云这个放荡女人的出现，更加衬托了金雯青的残忍和无能，说明他连妻妾都拘禁不严，那堪国家重任。作者非

常赞同“彩云是此书主中之宾”，并非“书中主人翁”的评论，并称之为“我书的知言者！”也许正是这个道理。

的确，不论是“达官”，还是“名士”，都是一批“糊涂的蠢虫”，但他们也有他们的长处，叫做“头儿尖些，手儿长些，心儿黑些”，投机钻营，骄奢淫佚，却是颇为能干的。看，浙闽总督，“纳贿买缺”；“贵州巡抚，“侵占铜项”，而那个赫赫有名的直隶总督“李公”，更有许多“骄奢罔上的款项”。官场之中，一片黑暗：“贿赂彰闻，苞苴不绝，里头呢，亲近弄臣，移天换日；外头呢，少年王公，颠波作浪”，早已不成一个世界了。作品从揭露和批判达官名士出发，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，政治的腐败，而且作为一种普遍现象严加谴责，这不是作品的反封建倾向又是什么？

面对作品实际，《孽海花》的否定论者，也不得不承认作品“对于封建统治的腐朽也有牢骚”（其实，岂止牢骚），但他们又认为，作品对“最高封建统治者却并没有什么仇恨”，而皇帝则是封建统治的集中代表，不反对最高统治者，自然也就不反封建了。果真如此吗？事实最有说服力，这里暂且不说小说开头对历代皇帝的攻击，就是作品中出现的两个最高封建统治者：一个是慈禧太后，一个是光绪皇帝，作者就着意描写他们各树党羽，各怀心机，勾心斗角，争权夺利的斗争，恨不得我踢你一脚，你还我一拳。慈禧太后妄图一手遮天，不肯让权，光绪皇帝则千方百计要夺回权力，明争暗斗，互相揭短，彼此掣肘，甚至不惜置对手于死地，造成了宫廷内部的极大混乱，这难道不是对最高统治者的不满和仇恨吗？如果这还不算，那末第二十回描写余敏和鱼邦礼买官一事，总该可以看出作者的感情和倾向了吧！在这里，作者明显地告诉读者，后党卖官，帝党也鬻爵，鱼邦礼的成交，就和当今皇上光绪帝有直接的纠葛，至少也是帝党的一桩丑闻，所以有人干脆就挑明：“姓鱼的认得了皇妃的亲戚，在皇上御前保举的。”而从鱼邦礼刚刚出任上海

道，就被慈禧太后革了职，更可看出其中的关系。可见，慈禧和光绪虽然彼此争权，但在腐败这一点上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正因为后党腐败，帝党肮脏，一时卖官鬻爵，适成风气。许多外官都带着十万、二十万银子，特地跑到京城寻找门路，或走“东道”，或钻“西墙”。卖官鬻爵，成了当时宫廷的一门大买卖，有专门的机关和场所，听凭选择和利用，更有专门掮客，从中作伐疏通，生意好不兴隆，以致童谣四起，家喻户晓：

若要顶儿红，麻加刺庙拜公公；若要通王府，后门洞里估衣铺。

这几句童谣虽然专道慈禧太后和王府的腐败，其实帝党人物，也在西餐馆和妓院里，做着同样的勾当。而作者在描写这些丑闻时，愤怒之情流露于笔端，即使客观地揭露最高统治者的“阴私”，不也是“大逆不道”吗？怎能说对最高统治者没有什么仇恨呢？

整个封建统治者就是这样腐朽糜烂，上自皇帝、皇太后，下至封建士大夫，一个个腐败已极，无能透顶，这只能阻碍社会历史的发展，封建社会的总崩溃，也势在必然。“专制国终纒专制祸”，《孽海花》就是在揭露和批判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中，在鞭挞和谴责封建统治者的腐败和昏庸中，表现了作品鲜明的反封建倾向。

## 二

《孽海花》是否也表现了反帝倾向呢？有些评论者说，没有。他们认为“作者对于帝国主义的态度，就谈不上有反抗的觉悟和要求”，理由是：作品掩盖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，对帝国主义分子“绘形绘色”，甚至“百般美化”，谈不上有什么反帝倾向，顶多是“作者对于帝国主义侵略感到不安”。的确，《孽海花》的作者对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缺乏深刻的认识，对某些帝国主义分子的描写，也不尽精当和准确，但说作者对帝国主义侵略没有反抗的觉悟和要求，那恐怕就不符合作品实际了。这里，尽可撇开初版小说中，对帝

国列强的愤怒谴责，就是修改后的《孽海花》又何尝不是洋溢着对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不满和仇恨，反抗和斗争？

“一霎狂潮陆沉奴隶岛”，作品的第一回，作者就把帝国主义列强比作一阵“怪风大潮”，正向奴隶岛迎面扑来，连岛根也“岌岌摇动，要被海若卷去的样子”，象征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；中国正面临被列强所瓜分的悲惨命运；非但“东三省快要不保了”，就是全中国“十八省早已都保不了！”中国就要陆沉了！可是，一般国民却不知觉悟，“还是醉生梦死，天天歌舞快乐”，而“那班肥头胖耳的洋行买办，偷天换日的新政委员，短发西装的假革命党，胡说乱话的新闻社员”，更是“没事的一般，依然又麻雀，打野鸡，安垵第喝茶，天乐窝听唱：马龙车水，酒地花天”。对此，作者感到焦急，更感到气愤，沉痛而又带着祈望地写道：“三十年旧事，写来都是血痕；四百兆同胞，愿尔早登觉岸”，这里的“血痕”哪里来，难道不是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血泪控诉吗？作者呼唤四百兆同胞“早登觉岸”为的又是什么？难道不是希望中国人民提高觉悟，奋起斗争，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吗？作者这种强烈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激情，怎能说没有反帝的要求和觉悟呢？《孽海花》的反帝倾向，又怎能抹杀的了呢？

应该说，作者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已有一定的认识，看到了列强侵略中国的必然性。他曾借书中人物之口，强调指出：“现在在国内力充实，譬如一杯满水，不能不溢于外，侵略政策，出自天然。”因而，在作品中，作者愤怒地揭露了法国帝国主义“得步进步”的侵略阴谋，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有步骤地挑起中日甲午战争，践踏我国主权，吞并中国大片领土，逼使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的侵略罪行。对那个阴险狡诈的老沙皇表面上大谈什么“中俄友谊”，实际上却“逐渐侵入”，制造所谓“中俄分界图”的假地图，明目张胆地将中国大片领土划为己有，疯狂地参与瓜分中国领土的罪

恶活动。作品对英美等帝国主义瓜分、侵略中国的罪行，虽没有正面描写，却也暗示和指责了他们表面装公正，背地里支持和纵恿日本等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。这些都说明作者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活动，是有所揭露和批判，并对中国这种“国威夕替，外侮丛生”的现象，感到无比的悲愤，不能说作者对帝国主义侵略没有反抗的觉悟和要求，抹杀作品的反帝倾向。

正因为作者有一股爱国主义热情，有着反帝的觉悟和要求，所以，作者才能在作品中，痛感于一般国民的不知反抗，苟且偷安，痛斥威毅伯等投降派投降卖国，非议那些“主”而不“战”，无能误国的“主战派”，热情地歌颂那些在反侵略中英勇战斗的英雄人物。在中法战争中，刘永福和老将冯子材曾经是有功人物，他们不畏强敌，出生入死，凭着自己的爱国热情，英勇抗拒法帝的侵略，并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，作者就专写一首《花歌曲》，表彰和歌颂他们的英雄事迹。

将军(指刘永福——引者)一骑从天下，四下里雄兵围得不留罅；安邨丧命崇英逃，一战威扬初下马。

将军(指冯子材——引者)誓众筑长墙，后有王孝祺，前有王德榜，专候敌军来犯帐。

果然敌人全力来进攻，炮声隆隆满空；将军屹立不许动，退者手刃不旋踵。

忽然旗门两扇开；掀起长须大叫随我来！两子随后脚无鞋。

作者就是这样，怀着深深的敬意，热情地歌颂他们敢于斗争，善于斗争的英雄事迹；而对他们在反帝斗争中取得的胜利，更是感到由衷的喜悦。一首《花歌曲》，就是一曲反侵略的颂歌，又是一篇讨伐投降派的战斗檄文，谁能说作者没有反帝的觉悟和要求呢？

有些评论者为了抹杀《孽海花》的反帝倾向，竭力否定作品对投降派的批判，甚至

认为小说“对于国人皆曰可杀的威毅伯，反有许多阿谀颂扬的话”。的确，作者没有这些评论者的态度鲜明，直言威毅伯“可杀”，但只要细读作品，我们就会看出，威毅伯投降派的帽子，是无论如何也摘不掉的。作品对投降派威毅伯的揭露和批判是相当明显，也是比较充分的。他在中法战争中“只知讲和”，甚至不惜用爱国将士的鲜血去取悦敌人，逼着朝廷签订卖国条约，“人不知鬼不觉”地出卖国家利益。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，又是他“不肯轻启兵端”，幻想列强“调停”，有意坐视国土的沦丧，而后又亲赴日本，签订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，甚至连挨了子弹，受了伤，也不肯停止卖国活动：“威毅伯虽耗了一袍袖的老血，和议速度却添了满锅炉的猛火，只再议了两次，马关条约的大纲，差不多快都议定了。”这里不是把威毅伯急于投降卖国的可耻嘴脸，表现得维妙维肖，酣畅淋漓吗？诚然，作者对威毅伯也说过一些“好话”，诸如说中法战争中，中国总算没有“赔款割地”，这是威毅伯“折冲樽俎的大功”，“国人应该纪念不忘”等等，可是，听话听音，只要看一看威毅伯的所作所为，这类的“好话”、“赞语”，何尝不是一种反语和讽刺？

正确地揭示十九世纪末叶，中国面临帝国主义瓜分的悲惨命运，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罪行，谴责投降派的卖国活动；斥责清王朝统治者腐朽没落，无能误国；歌颂反侵略将士的英勇斗争精神，这些就象一条红线那样，或明或暗，或浅或深地贯串于《孽海花》全书之中，而又与作者悲愤的心情，朴素的爱国热情交织在一起，表现了作者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觉悟和要求，体现了作品的反帝倾向。无疑，这对中国人民加深对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认识，并进而积极投入反侵略斗争，是有积极的进步作用的。

### 三

二十世纪初年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在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激烈斗争中，有了

很大的发展。一九〇五年以孙中山为首的“同盟会”的成立,更标志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。这时资产阶级改良派作为一种社会思潮,虽然还有相当的力量,影响着—部分群众,但资产阶级革命派却代表了当时社会的先进思潮,体现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。而《孽海花》恰恰出现于这段时间,它在这两种思潮的斗争中,究竟站在哪一边呢?是否如某些评论者所断言的那样,作者是站在保皇党的立场上,鼓吹君主立宪,丑化和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呢?这确是评论《孽海花》政治倾向的又一个重要问题。

有比较才能鉴别。《孽海花》究竟鼓吹君主立宪,还是同情、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,最好还是把作者对这两者的态度作一番比较。作者在作品中,曾借革命党陈千秋物色党人的描写,对活跃于当时社会上的各种人物,作过倾向鲜明的评论:

谁知四下里物色遍了,遇着的,倒大多数是醉生梦死花天酒地的浪子,不然就是胆小怕事买进卖出的商人。再进一步,是王紫诠派向太平天国献计的斗方名士,或是蔡尔康派替广学会宣传的救国学说,又在应酬场中,遇见同乡里大家推崇的维新外交家王子度,也只主张废科举,兴学堂。众人惊诧的改制新教王唐犹辉,不过说到开国会,定宪法,都是些扶墙摸壁的政论,没有一个挥戈回日的奇才。——第二十九回。

这里,作者把“浪子”、“商人”、“斗方名士”,“新闻社员”之类的人物载入另册,自然是理解的。奇怪的是,作者竟将王子度、唐犹辉等也排除在“奇才”之外,这就很足以表明作者的政治倾向了。王子度,影射黄遵宪,是个维新派。唐犹辉就是当年改良派的首领,后来又成了君主立宪派鼻祖的康有为,可是,作者却连这样一位“改制新教王”,也给否定了,不承认他是“奇才”,攻击他的理论主张,不过是一些“扶墙摸壁的政论”,隔靴抓痒,无济于事。说他不敢“挥戈回日”,拿起枪杆,进行

改天换地的革命。既然作者主张“挥戈回日”,那末,《孽海花》鼓吹君主立宪云云,不知又从何说起?

“输他海国风云壮,还我轩皇土地来”,作者不仅看到了在当时的情况下,只有“挥戈”,搞武装革命,才能“回日”,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,建立崭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,而且意识到,只有象陈千秋这样革命党人,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,扭转乾坤,恢复中华,捍卫国家和民族的独立。正因为这样,作者在作品中,对孙中山、陈千秋、陆皓冬、史坚如等革命党人,就寄以莫大的期望,满腔热情地赞扬和歌颂他们是“人豪”、“青年志士”、“意志坚强的志士”,高度地评价了他们的为人和从事的革命活动。特别是对革命党人的领袖孙中山,作者更是充满激情,无比崇敬。读一读《孽海花》,就不难发现,作者在众多人物的描写中,没有一个象描写孙中山那样,倾注着那样深厚的感情,刻划得那样不同凡响。

也正因为作者寄希望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,所以作品中,作者处处以同情和肯定的笔调,比较详细地描写了青年会的发展壮大和革命党人的战斗历程。在小说中,我们看到这批以青年会为中心的革命党人,都有比较明确的斗争目标,他们深深懂得“现在中国是少不得革命的了”,他们“要组织我黄帝子孙民族共和的政府”。因而,他们“个个精神焕发,神采飞扬,气吞全球,目无此虏”。而且,他们有言,更有行,积极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。有一部分人带着革命的使命出洋留学,为将来“建立新权之用”;一部分前往内地招集同志,扩大势力,准备破坏旧政府。于是,他们千方百计购买武器,联络各地会党,团结一切革命力量,为“光复汉土”,不懈地工作和战斗,青年会很快得到发展和壮大,终于成立了“兴中会”,成为当时一支不可抗拒的社会力量。这里,作者不仅描写了革命力量的发展,实际上也暗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趋势,表现了作者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希望和

同情,肯定和祝贺!

也许有人要反驳,作者在描写那些封建官僚和维新派时,不也曾用过“气概昂藏,谈吐风雅”之类的赞语吗?这不是肯定和美化封建官僚和维新派吗?作者还写了革命党人逛妓院“吃酒解闷”,这不是丑化和歪曲革命党人吗?事实上,有些评论者,正是从作品的这些描写中,否定小说同情资产阶级革命,进而又作为作品鼓吹君主立宪,反对革命的佐证。对不对呢?不对。那帮封建官僚和维新派,尽管满肚子男盗女娼,但却总要假装斯文,故弄风雅,这是他们的特点,说他们“气概昂藏,谈吐风雅”,又有什么不可理解呢?难道作者一定要给封建官僚和维新派,画一道白鼻子,在他们脸上抹一层灰,才算是揭露吗?至于个别革命党人在碰到困难时,跑到妓院“吃酒解闷”,更不能认为是对革命党人的丑化,因为他们毕竟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,怎能用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标准来要求他们呢?况且作者还是把它当作个别现象,并没有推而广之,加到一切革命党人身上。作者写革命党人陈千秋在遇到挫折时,就说他“还在天天计议革命的事”,这些怎能视而不见呢?那种不作具体分析,根据片言只语或个别现象定是非的做法,只能是歪曲作者原意。

#### 四

《孽海花》产生于二十世纪初叶,反映了清末同治初年到甲午战争这三十年间,中国社会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,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,要求资产阶级革命,维护国家统一,捍卫民族独立的思想倾向,顺应了历史的发展,应当属于资产阶级革命小说的范畴,而且,鉴于它反映的迅速和艺术上的成就,还是一部比较优秀的资产阶级革命小说,也许这就是小说问世后,受到时人重视和喜爱的重要原因。

当然,《孽海花》作为一部资产阶级革命小说,在肯定其基本思想倾向的同时,也必须看到它的缺点和局限,甚至错误。的确,

《孽海花》具有相当鲜明的反帝倾向,但一般还停留于对帝国主义侵略事实的揭露,未能更好地从本质上进行批判,反映了作者对帝国主义虽有一定认识,但更多的还是一种直觉的感受,而不是理性上的觉悟。这样,作品就不能从整体着眼,从帝国主义本性上去揭露他们的侵略罪行,相反,往往孤立地描写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,有时甚至看成只是一种偶发事件,或者个人的行动,没有着重去揭示他们深刻的政治背景。第二十八回对一对日本男女间谍的描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。小山清之介和花子于甲午战争期间,潜入中国收集军事情报,进行间谍活动,理应出自日本帝国主义的派遣,是日本统治者的侵华政策的反映,可是作者却津津乐道于他们之间的风流佚事,把他们潜入中国从事间谍活动,主要归于寻找一条自我解脱的道路,而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精心策划,这就有意无意地掩盖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。

在描写清朝官员和帝国主义的关系时,又过分地强调清朝官员的愚蠢和他们受愚弄的一面,而没有用更多的笔墨去描写和揭露帝国主义的阴险和狡诈,这虽然批判了清朝官员的腐败,却无形中削弱了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谴责。书中对英美帝国主义积极参与瓜分中国的侵略活动,也暴露得不充分,甚至还存在某种幻想。这些都说明作品对帝国主义的揭露,一般还只局限于表面的事实,而未能深入本质,表现了作品反帝的不彻底性。

应当承认,《孽海花》对清王朝腐朽没落的揭露和批判,是相当充分的。但所谓充分,主要是就其广度而言,要论深度则又同样显得很不够。诸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会腐朽没落,作者的认识就很肤浅,错误地认为这是由于所谓“德宗(指光绪——引者)和太后的失和”,“东西宫的争权”<sup>⑥</sup>等等。其实,最高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,除本身原因外,根本原因还是当时各种社会矛盾,特别是阶级和民族矛盾不断激化的反映。可是作者对这点却根本不理解不认识,因而也就只能

唯心地把现象当成本质，结果看成原因，完全颠倒本末关系和因果关系。也正因为这样，所以作者尽管看到了光绪和太后同样腐败，却不能从整体上去进行揭露和批判，而将批判矛头主要指向慈禧太后，而对光绪就不能不有所原宥和同情，甚至寄托幻想，似乎只要他掌握了实权，国家也许还会有转机，说什么，“国家政治，既有刷新的希望，朝野思想，渐生除旧的动机。”这就近于美化光绪了。于是，作品中对于光绪皇帝的描写，就产生一种矛盾的现象，即事实上的揭露和表面上的同情，甚至美化。这在思想上反映了作者对封建制度缺乏本质认识，而在艺术上也是一种败笔。与此同时，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者，虽然有矛盾和斗争，但在反对中国人民这一点上，又往往互相勾结，彼此有着内在的联系，可是这在作品中，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。这也说明，《孽海花》对封建制度的揭露和批判，同样是不深刻，不彻底的。

《孽海花》总的说来是同情和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，但对当时出现的各种社会思潮的批判又是不坚决的，甚至有局部的肯定，带有比较浓厚的调和色彩。如洋务派人物成木生（影射盛宣怀），作者就有好感，特别是他举办招商轮船局，作者就认为这是“中国在商界上第一件大纪念”，深表支持和首肯。与此相反，有时对资产阶级革命又有所保留，如主张把宣扬“革命”、“流血”、“平等”、“自由”的卢梭《民约论》，孟德斯鸠的《法律魂》一类的书尽情禁绝，“不让人寓目才好”，这虽不是作者的正面主张，却也没有给以应有的批判，反映了作者的态度比较暧昧。这种调和的色彩，到了修改后的《孽海花》就表现得更加突出，更加严重，甚至公然认为他们虽然“主张各异，救国之心，总是殊途而同归”。<sup>⑩</sup>

《孽海花》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和局限，当然和作者的世界观和艺术观有密切关系。

但首先还是历史的必然，也是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性的反映。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认识，本来就有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，更何况，中国资产阶级还是先天不足，他们“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，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……即使在革命时，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，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者有密切联系，因此，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，更加不愿意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。”<sup>⑪</sup>而在文化思想上，这个阶级甚至“比它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”。既然如此，《孽海花》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小说，存在反帝反封建的不彻底性，也就完全可以理解的了。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小说，只要它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倾向，而又同情和支持资产阶级革命，那应该说它也就完成了它自己的历史使命。而《孽海花》恰恰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，为什么不能列入资产阶级革命小说的行列呢？完全有理由，也完全有资格。因此结论只能是：《孽海花》是我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一部比较优秀的资产阶级革命小说。

“孽海“之”花”，为自由而开！

注释：

- ①、③、⑩、曾朴：《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》。
- ②《负喧絮语》：“近来新撰小说，风起云涌，无虑千百种，固不乏佳构。而才情纵逸，寓意深远者，《孽海花》为巨擘。”
- ④阿英：《晚清小说史》
- ⑤引文见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《光明日报》《文学遗产》：《如何看待晚清的文学和政治》一文，以下凡是该文的引文不再一一注出。
- ⑥此为“小说林”版（即初本）《孽海花》的原文，转引自魏绍昌同志的《孽海花资料》一书，以下凡有初版的引文均出自魏书。
- ⑦凡《孽海花》修改本的引文，均据中华书局1959年版《孽海花》。
- ⑧恩格斯：《给明娜·考茨基的信》。
- ⑨鲁迅：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。
- ⑪《孽海花》第三十四回。《孽海花》三十一至三十五回，只在当初杂志上发表，没有编入作者1928年改定本。
- ⑫、⑬毛泽东：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。